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 2020 报告概要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亚洲经济增速在 2019 年出现超预期下行，并且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速分化加大。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受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合作中不确定性的影响，亚洲经济体商业信心、投资决策遭遇冲击和干扰，生产和贸易成本增加，经济活动总体上明显放缓。同时，亚洲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动力不足，物价走势分化加大。但亚洲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收入有所提升，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进入 2020 年，亚洲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短期因素主要源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压力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面临中断风险。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有增无减，严重抑制了全球贸易投资往来，极大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还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并影响全球产业链格局。中期因素主要源于亚洲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递减。长期因素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意味着盈利等预期长期都不被看好，由此对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展望未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金融风险特别是债务风险累积、发达经济体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地缘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以

及原油价格走向尤其值得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将是评估亚洲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程度的重要因素。2007—2019年，包括亚洲在内全球共有48个新兴经济体的外债依存度明显上升，债务风险逐步累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可能成为这种风险敞口的放大器。负利率政策不仅对当事国经济走势带来重大影响，其升级和蔓延也会引起其他国家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波动。负利率对亚洲经济带来的影响复杂而广泛，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地缘政治冲突、国内社会问题以及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向的影响不可忽视。

考虑到各种迟滞增长的因素多数在中长期内不会消失，各国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会对消费与投资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效应逐步进入收敛区间，以及各国监管当局已对各种金融风险采取措施严加防范，总体而言，未来数年亚洲经济仍将在中低速轨道内前行。2020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总体经济很可能出现零增长。但最终经济走势如何还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及各国应对情况。如果下半年全球疫情缓解而经济反弹较强，也可能实现正增长；但如果疫情反复或经济刺激政策效果不彰，也不能排除出现更严重负增长的可能。

2019年以来，亚洲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有所减弱，但区内在贸易、生产、投资等各方面的一体化进程仍在向前推进。2019年底，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就RCEP文本达成一致，是一体化向前迈进的重要体现。然而，在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科技壁垒、国际制裁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幅减速的背景下，亚洲经济一体化阻力加大。2020年初开始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供应链受到重创，商品、服务和人员跨境流

动停滞，资金链受阻，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亚洲区域内以及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程度之深。

在货物贸易一体化方面，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长期趋势增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除美国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出现下降外，其他经济体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则进一步提升。尽管中美两国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表明贸易紧张局势有缓和的迹象，但全球贸易体系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油价崩塌等因素都给预测未来亚洲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增添了不确定性。

在生产一体化方面，2018 年亚洲中间品贸易的增长率出现了剧烈下降，与全球趋势相同。对中间品流动的网络分析显示，亚洲区域内中间品流动仍然占主导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在亚洲全球价值链构建中的重要枢纽作用。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过长，会带来全球和区内产业链的调整。

在直接投资方面，亚洲直接投资对区内依存度进一步增加。2018 年，在全球 FDI 连续第三年下降的大背景下，流入亚洲发达经济体的 FDI 达到了 201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亚洲内部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大幅上升，从 2017 年的 53.31% 上升到 2018 年的 63.42%，这表示出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

从服务业贸易情况看，旅游业一体化趋势有所加强，但亚洲服务业贸易相互依存度仍然较低。在新冠疫情下，如何更好地提升旅游业的抗冲击能力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是服务业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最后，金融一体化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反映，也为经济融合助力。从法定与事实金融开放度的角度来看，亚洲各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开放度近十余年来逐渐增长。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亚洲主要经济体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更加本土化。2018 年以来，亚洲投资者在全球资产组合方面也大幅收紧了对外的资产投资组合。

总之，亚洲经济一体化乃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通过降低关税、取消壁垒和促进贸易来解决，而不是走限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回头路。疫情后，亚洲各国在加大卫生体系投入和流行病防控来增强消费与投资信心的同时，需要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消费市场升级、向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来获得更强的增长源动力、竞争力和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